

# 东周时期刻纹铜器再检讨

滕铭予

**关键词：**东周时期 刻纹铜器 吴越地区

**KEYWORDS:** Eastern Zhou Bronze Vessels with Inscribed Ornamentation Wuyue Region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iconography and the style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on bronze vessels with inscribed ornamentation from the Eastern Zhou,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kind of bronze vessels that originated in the Wuyue region and that a wholistic process of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disappearance can be observed. Bronze vessels with inscribed ornamentation in the Wuyue region were intensively transmitted to surrounding areas during the end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ring States. After the vessels came to the Central Plains, local craftsmen fashioned simulations based on imported prototypes. The same kind of bronze vessels from the state of Zhongshan, made under the influence from Central Plains and western Liaoning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cultural sphere of Yan, were probably imported having passed through many hands via the Central Plains. In contrast, bronze vessels with inscribed ornamentation found in Chu, Qi and other regions were likely imported sporadically.

东周时期刻纹铜器，以在锻造成形的薄壁器物表面用坚硬的工具篆刻出大量由人物、神怪、动物、植物、建筑等构成的图像为主要特征<sup>[1]</sup>，主要有盘、鉴<sup>[2]</sup>、匜等水器，也有少量匕、奭和算形器。其图像的制作工艺，与同时期出现的画像铜器中或使用镶嵌技术<sup>[3]</sup>，或直接铸出减地平雕式图像<sup>[4]</sup>的方法完全不同，加之图像内容非常丰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早期的研究者多注重图像内容，认为所展现的画面或为当时贵族生活的场景，如燕礼、射礼、蒐礼等，具有一定的礼制内涵<sup>[5]</sup>；或与当时的神话传说或宗教观念有关<sup>[6]</sup>。这些研究为了解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世界等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也有学者认为在春秋末年或战国早期，南、北方均出现了刻纹铜器，

与当时的画像铜器一样，都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初受到北方草原民族狩猎纹的刺激而出现的新技术风格<sup>[7]</sup>。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忽略了南、北地区最早出现刻纹铜器的墓葬在年代上存在着早晚的差别。还有很多学者认同最早的刻纹铜器起源于吴越地区，年代为春秋晚期或春秋末年<sup>[8]</sup>，后由这里向其他地区传播，传播的形式以整器传播的可能性最大，也不排除南方的工匠北上中原后在当地制造刻纹铜器的可能<sup>[9]</sup>。也有少数研究者认为刻纹铜器的原产地非晋莫属，但不排除其他地区有仿制的可能<sup>[10]</sup>。刻纹铜器最早起源于吴越地区可以说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对于在其他地区发现的刻纹铜器，目前占主流的观点认为主要是从吴越地区传播而来。笔者注意到吴越地区以外发现的部分刻纹铜

作者：滕铭予，长春市，130012，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器在图像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与吴越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似乎应有不同的来源。因此本文以考古发现的刻纹铜器为研究对象<sup>[1]</sup>，拟观察图像内容及表现方式和手法，对刻纹铜器的起源与发展、传播、制作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检讨。

一

发现刻纹铜器的地点比较多，目前在江苏、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河北、北京、辽宁等省市均有发现。根据发现地点在东周时期的文化归属，大体可划分成吴越文化区、三晋两周文化区、楚文化区、齐文化区和燕文化区（图一；附表一）。

1. 吴越文化区

发现地点有江苏六合程桥<sup>[12]</sup>、六合和仁<sup>[13]</sup>、镇江王家山<sup>[14]</sup>和淮阴高庄<sup>[15]</sup>。春秋时期这里是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战国初年越灭吴后取吴故地，这里可见到越文化的影响。目前年代最早的刻纹铜器即发现于该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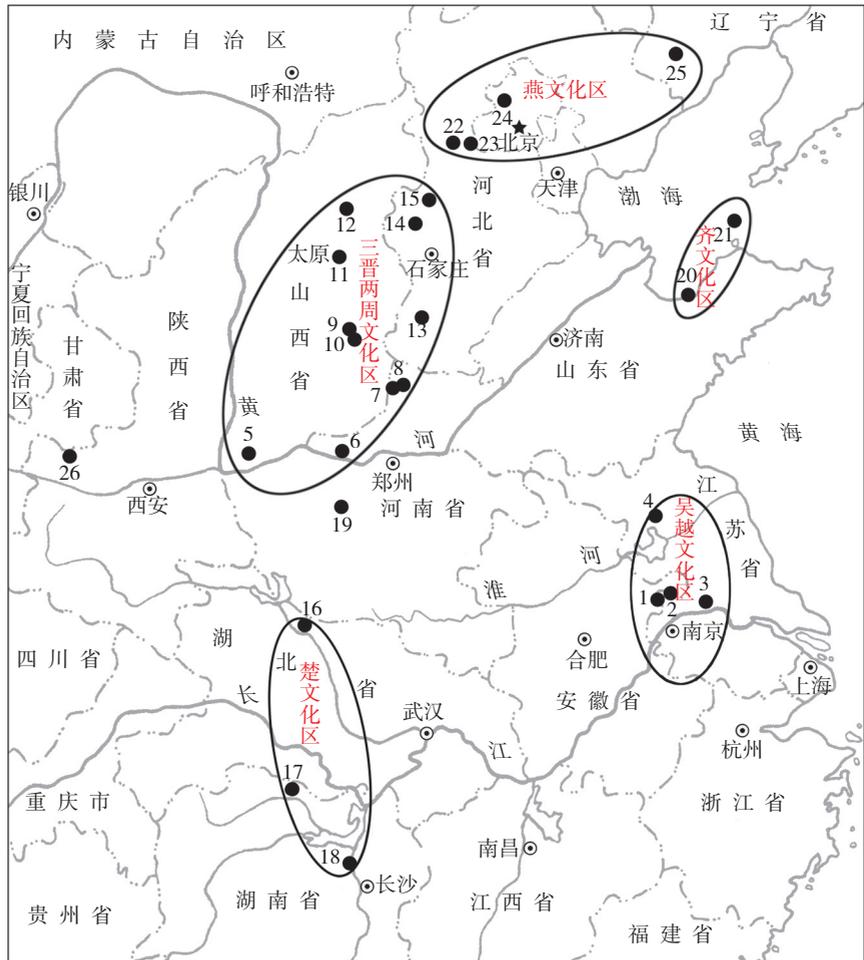
2. 三晋两周文化区

发现地点有河南陕县后川<sup>[16]</sup>、洛阳<sup>[17]</sup>、辉县琉璃

阁和赵固村<sup>[18]</sup>，山西潞城潞河<sup>[19]</sup>、长治分水岭<sup>[20]</sup>、太原金胜村<sup>[21]</sup>、定襄中霍村<sup>[22]</sup>，河北邯郸百家村<sup>[23]</sup>等。另外在河北平山灵寿城<sup>[24]</sup>和行唐故郡<sup>[25]</sup>等属于中山国的墓葬中也发现有刻纹铜器。由于在这些墓葬中均表现出其受到了三晋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一并归入三晋两周文化区进行讨论。

3. 楚文化区

发现地点有湖北襄阳余岗<sup>[26]</sup>，湖南澧县皇山岗<sup>[27]</sup>、长沙黄泥坑<sup>[28]</sup>。



图一 刻纹铜器发现地点位置示意图

- 吴越文化区 1.六合程桥 2.六合和仁 3.镇江王家山 4.淮阴高庄
- 三晋两周文化区 5.陕县后川 6.洛阳 7.辉县赵固村 8.辉县琉璃阁 9.潞城潞河 10.长治分水岭 11.太原金胜村 12.定襄中霍村 13.邯郸百家村 14.平山灵寿城 15.行唐故郡
- 楚文化区 16.襄阳余岗 17.澧县皇山岗 18.长沙黄泥坑 19.河南平顶山
- 齐文化区 20.平度东岳石村 21.长岛王沟
- 燕文化区 22.易县燕下都 23.涑水永乐村 24.北京通州中赵甫 25.建昌东大杖子
- 26.凤翔高王寺

平顶山应国墓地M10亦出土有刻纹铜匜残片，因其随葬的青铜礼器以楚系青铜礼器为主<sup>[29]</sup>，亦归入此区。

4. 齐文化区 发现地点有山东平度东岳石村<sup>[30]</sup>和长岛王沟<sup>[31]</sup>。

5. 燕文化区 发现地点有河北易县燕下都<sup>[32]</sup>、涑水永乐村<sup>[33]</sup>和北京市通州区中赵甫<sup>[34]</sup>。另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sup>[35]</sup>，属于燕文化扩张所至地区。

另外，在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出土了一件刻纹铜匜<sup>[36]</sup>，只是简报未发表任何与刻纹匜相关的图像，因此本文无法对其进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该窖藏出土的其他遗物以楚系青铜礼器为主，不排除窖藏的所有者或埋藏者与楚有关。

上述出土有刻纹铜器墓葬的年代大体上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个别墓葬的年代需进一步说明。太原金胜村M251，原报告认为其年代为春秋晚期，朱凤瀚先生认为该墓年代为战国早期早段<sup>[37]</sup>，笔者认同朱先生的观点。辉县赵固M1，原报告认为其年代为战国晚期，笔者认为赵固M1的年代应在战国中期早段<sup>[38]</sup>。东大杖子M11，原报告认为其年代在战国早期<sup>[39]</sup>。该墓与2003年发掘的亦随葬有刻纹铜器的M45南北相邻，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上有颇多相近之处，两墓出土的东北系青铜短剑形制几乎完全相同，林沅和朱凤瀚都将与M11和M45所出短剑相近者划分为B型，认为这种形制的剑的年代大体在战国中期<sup>[40]</sup>。笔者认同上述学者的观点。

其余出土有刻纹铜器墓葬的年代，如无特殊说明，均依原报告年代或朱凤瀚先生《中国青铜器综论》中对相关墓葬年代的判定。

## 二

通过对刻纹铜器图像的观察，发现不同地区刻纹铜器图像刻划的内容和风格既有共

性，又表现出各自的特点（附表二）。由于在吴越文化区发现的刻纹铜器年代最早，包含了盘、鉴及匜等最主要的器类，图像内容也最为丰富，因此本文的讨论从对吴越文化区刻纹铜器的分析入手。

### （一）吴越文化区

目前已知出土刻纹铜器中年代最早者为江苏六合程桥M1，该墓依朱凤瀚先生《中国青铜器综论》的认识，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晚阶段<sup>[41]</sup>，即春秋末年。

盘、鉴和算形器 吴越文化区盘、鉴底部图像多以对卷和相互勾连的水蛇纹、奔跑状的兽纹为主，可依纹饰带的数量和表现方式，以及中心部位是否有纹饰等分四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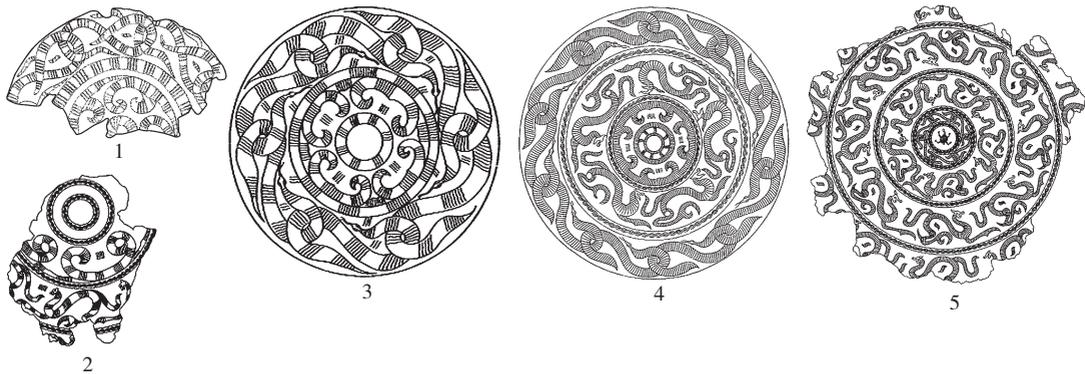
I式：双重纹饰带，分别为对卷和相互勾连的水蛇纹，中心有一周同心圆间隔纹，水蛇纹和间隔纹内用4~8条竖线纹间隔。六合程桥M1出土铜盘、镇江王家山：36铜盘、王家山：采52铜鉴（图二，1）和淮阴高庄M1：48铜盘（图二，3）均属于此式。

II式：三重纹饰带，分别为对卷的水蛇纹和奔跑的兽纹，最外层因残破纹饰不清，中心有两周同心圆间隔纹，水蛇纹和兽纹体内用4~8条竖线纹间隔，间隔纹为绳索纹。淮阴高庄M1：0149铜盘属于此式（图二，2）。

III式：三重纹饰带，分别为对卷水蛇纹、奔跑的兽纹和勾连水蛇纹，中心两周同心圆间隔纹中用竖线纹连接，水蛇纹和兽纹体内填满竖线纹，间隔纹为绳索纹。淮阴高庄M1：3铜盘属于此式（图二，4）。

IV式：四重纹饰带，除中间一重为勾连水蛇纹外，其余三重均为奔跑的兽纹，中心饰龟纹，水蛇纹和兽纹体内填满竖线纹，间隔纹为绳索纹。淮阴高庄M1：0146铜盘属于此式（图二，5）。

由于算形器的图像与盘、鉴腹部图像有相同之处，因此将吴越文化区盘、鉴腹部图像和算形器图像统一进行观察，共分四式。



图二 吴越文化区刻纹铜器底部图像

1、3. I式(镇江王家山采:52鉴、淮阴高庄M1:48盘) 2. II式(淮阴高庄M1:0149盘) 4. III式(淮阴高庄M1:3盘) 5. IV式(淮阴高庄M1:0146盘)

I式:图像写实。六合程桥M1所出盘虽残,但可看到图像中有在露天进行的可能为飨礼的活动,还有猎杀动物的场面。人物头戴三叉冠,或无冠,或着长袍,或着袴;树木多为水滴状(图三,1)。

II式:图像写实,多分为两层或三层。有在多层建筑内举行的可能为飨礼的场面,建筑多为两层,另外还有击磬、射侯、狩猎等图像。人物形象多着长袍,戴三叉冠;个别着袴,无冠。或有车。镇江王家山东周墓:36盘(图三,6)、镇江王家山:采52鉴(图三,3),淮阴高庄M1:27、48盘均属于此式。

III式:出现神怪类题材,图像密布不分层。淮阴高庄M1:3盘,有狩猎纹,还有表现神山的类似凸字形的图案。人物和动物形象怪异,树木多有平伸的枝干(图三,7)。

IV式:以神怪类题材为主,图像密布不分层,怪兽、树木、人物形象等与III式相同,但出现了蛇和蜥蜴类的四脚长尾两栖动物。淮阴高庄M1:0146盘(图三,8)、高庄M1:114-4、2、1算形器均属此式(图三,2、4、5)。部分器物外壁也刻有图像。

匜 镇江王家山:采51,保留有底部,为相互勾连的水蛇纹(图四,8)。其余大

都仅存流部和腹部。这些刻划于流部和腹部的图像可分为不同的式别。

流部图像分三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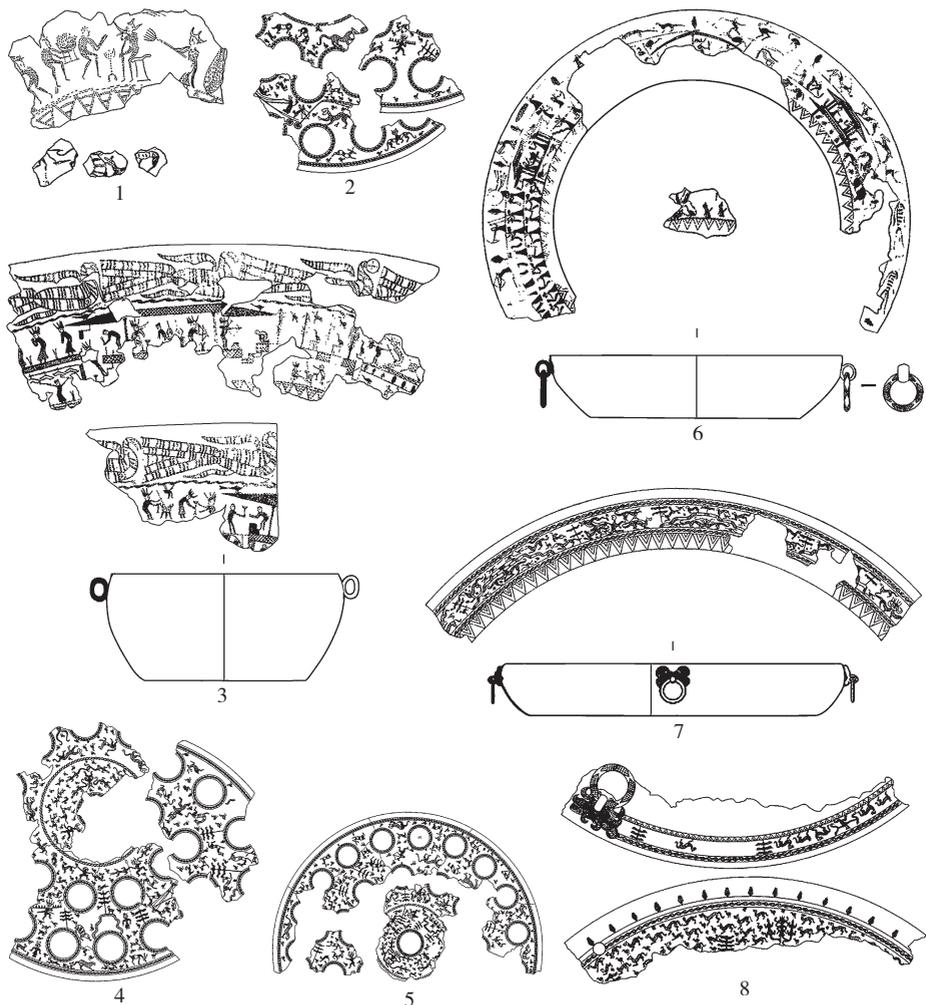
I式:不分段,为三游鱼。镇江王家山:采51(图四,1)属于此式。

II式:纵向为三列,中间一列分为三段,列与列、段与段间隔以菱格纹带。六合和仁东周墓出土铜匜的左侧一列为头向下的虎纹;中间三段由上至下分别为平伸枝干的树、鹿和人首双身兽(图四,4)。

III式:纵向为三列,中间一列分为数段,列与列、段与段间隔以绳索纹带。淮阴高庄M1:0138,流前部已残,左、右两侧为数个回首兽纹,间以鸟纹;中间仅存流后部三段图像,均为身上栖有鸟的兽纹,最下一段的兽纹为一首双身(图四,7)。

腹部图像与盘、鉴腹部图像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与之相对应。分别为I式:镇江王家山:采51(图四,1、3、6);II式:六合和仁东周墓出土(见图四,4);III式:淮阴高庄M1:0137(图四,9);IV式:淮阴高庄M1:0138(图四,2、5)。可能由于较深的缘故,匜腹图像分为三层到四层,并有刻于外壁者。

结合附表一,可知吴越文化区的刻纹铜器延续时间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图像题材和内容亦有明确的发展序列可循。



图三 吴越文化区刻纹铜器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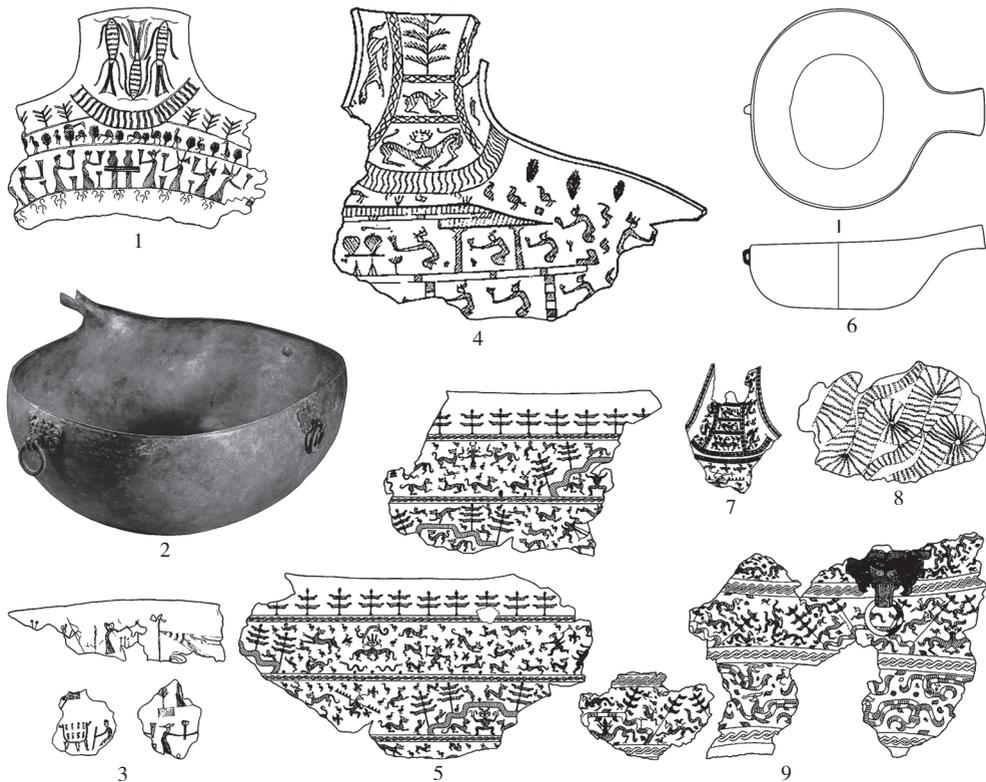
1. I式(六和程桥M1出土盘) 2、4、5、8. IV式(淮阴高庄M1:114-4、2、1算形器,淮阴高庄M1:0146盘) 3、6. II式(镇江王家山采:52鉴、镇江王家山东周墓:36盘) 7. III式(淮阴高庄M1:3盘)

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早期,盘、鉴底部图像以水蛇纹为主;腹部图像以写实的人物和活动现场为主,主要有饗礼、击磬、射侯、狩猎或车猎等图像,其中举行饗礼的地方,春秋末年为露天,战国早期则在建筑内进行,建筑的层数由少到多。匱底部图像为水蛇纹;流部图像以写实的动物纹为主,从不分段的三游鱼到开始分段,画面出现了个别的神怪形象。腹部的主体图像与盘存在较多的共性,在战国早期以写实的现实生活场景为主。

到了战国中期,盘、鉴底部出现奔跑状的神兽纹;腹部图像以神怪类题材为主。匱的流部图像分段数量增加,画面为写实的动物纹和神怪形象;腹部主体图像以神怪类题材为主,有些图像刻于外壁。此时出现用途不明的算形器,图像均以神怪题材为主。

### (二) 三晋两周文化区

三晋两周文化区发现的刻纹铜器以盘、匱为主,另有少量的奩和匕,大部分刻纹铜器的图像内容与吴越文化区相近,可以将其与吴越文化区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不过,



图四 吴越文化区刻纹铜甬及图像

1. I式流部和I式腹部(镇江王家山:采51) 2. 淮阴高庄M1:0138 3. I式腹部(镇江王家山:采51) 4. II式流部和II式腹部(六合和仁东周墓出土) 5. IV式腹部(淮阴高庄M1:0138) 6. 镇江王家山:采51 7. III式流部(淮阴高庄M1:0138) 8. 底部(镇江王家山:采51) 9. III式腹部(淮阴高庄M1:0137)

由于部分刻纹铜器的图像内容和表现方式与吴越文化区同类器物存在一定的差别,因此将该地区的刻纹铜器分为甲、乙两类<sup>[4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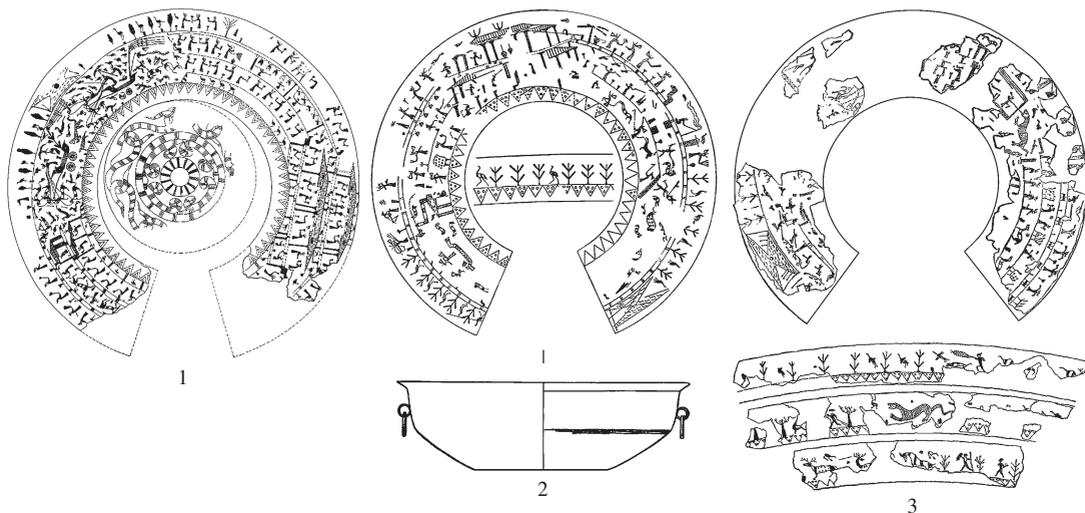
1.甲类 图像题材和内容与吴越文化区相同或相近。

盘 陕县后川M2040:76(图五,3)、辉县赵固M1:73(图五,2)形制相同,但底部图像均残破不清。长治分水岭M84:7,残,底部图像(图五,1)和吴越文化区I式相同。以上三件器物腹部图像相近,分二至三层,内容及表现方式与吴越文化区的II式相同。陕县后川M2040:76还有采桑图像。

辉县琉璃阁M1:51,残,原报告认定其为奩,盖部和腹部图像(图六,1)分别与吴越文化区盘底部、腹部图像相近。盖部图像(图六,2)与淮阴高庄M1:0146底部图像(见图二,5)几乎完全相同,相当于吴

越文化区盘底部图像的IV式;腹部图像(图六,3)大体与吴越文化区盘腹部图像的III式相当。

匜 太原金胜村M251:540(图七,1)、陕县后川M2042:8(图七,2)、长治分水岭M84:93(图七,3、5、7),前二者形制相近,后者形制不明。底部图像与镇江王家山:采51相同;流部图像均为三游鱼,即吴越文化区的I式;腹部图像或不分层,或分为两层,图像内容与吴越文化区的I式相同。长治分水岭M79:8底部残,流部图像为三游鱼;腹部图像残存在建筑内进行的飨礼(图七,4、6、9),大体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的II式。长治分水岭M12出土残匜,流部图像为三列,中列图像分三段,从上至下分别为树及其下双鸟、双鱼和长角兽(图七,8),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的II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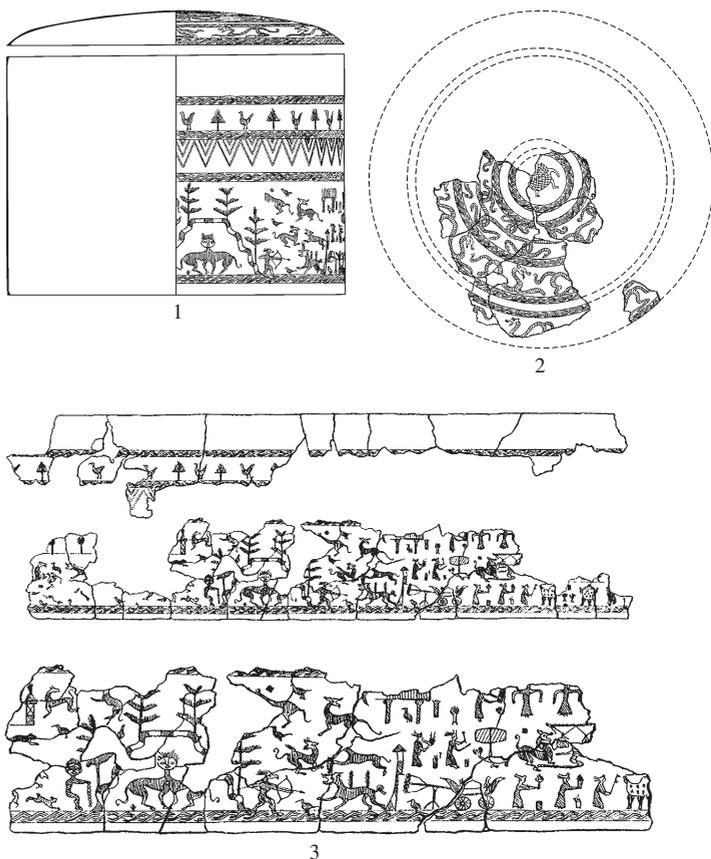


图五 三晋两周文化区甲类刻纹铜盘图像  
1. 长治分水岭M84 : 7 2. 辉县赵固M1 : 73 3. 陕县后川M2040 : 76

腹部图像仅存在三层建筑内进行的飨礼，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的Ⅱ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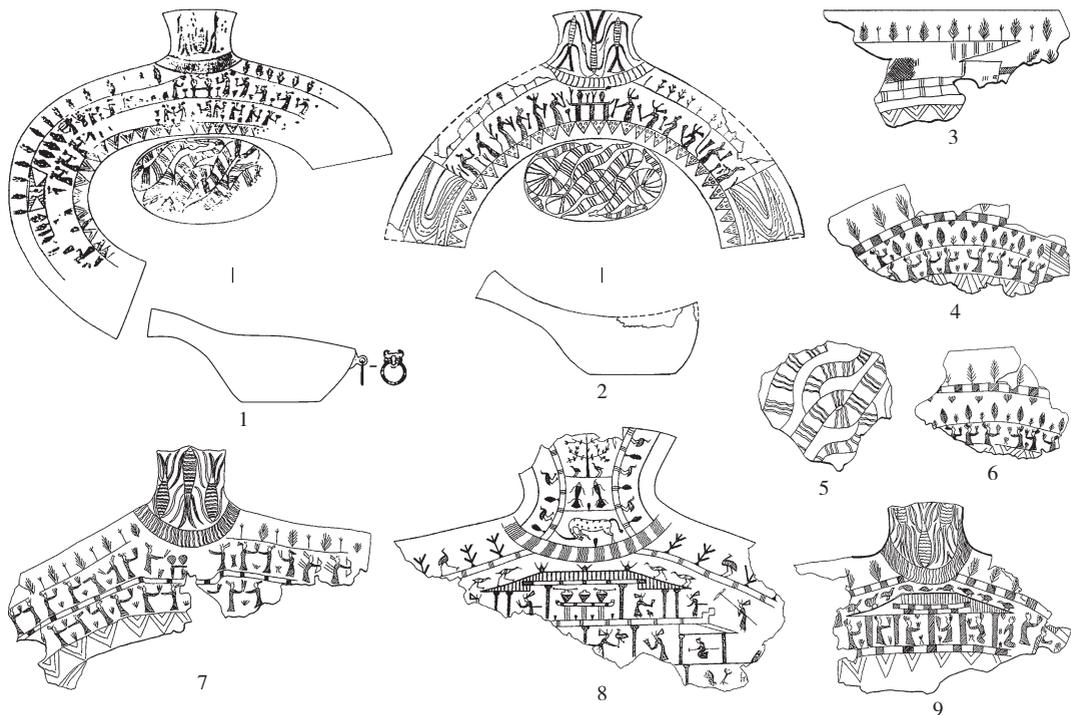
2.乙类 图像内容和表现手法与吴越文化区有差异。

盘 灵寿城穆家庄西M8101 : 4，形制与陕县后川M2040 : 76、辉县赵固M1 : 73相同。底部图像亦同于吴越文化区的Ⅰ式，只是外圈的水蛇纹疏朗而简化。腹上部刻划一周与王家山采 : 52鉴相同的飞鸟；下部图像有些部位为两层，内容大体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盘腹部图像的Ⅱ式。但图像中进行飨礼的建筑形制较为特别，在右侧和左侧各伸出一横梁，横梁一端曲折向上并有三角形顶，同时左侧横梁一端有横置的屋顶。另外，该图像中有两辆车，车厢为平板状，两端不上翘，其中一车驾三马，单轮，顺时针行驶。人物大多着袴，无冠，少数戴三叉冠者亦着袴（图八）。上述建筑、车、人物等形象和表现手



图六 辉县琉璃阁M1 : 51刻纹铜奩及图像  
1. M1 : 51 2. 盖部图像 3. 腹部图像

法不见于吴越文化区和三晋两周文化区的甲类盘、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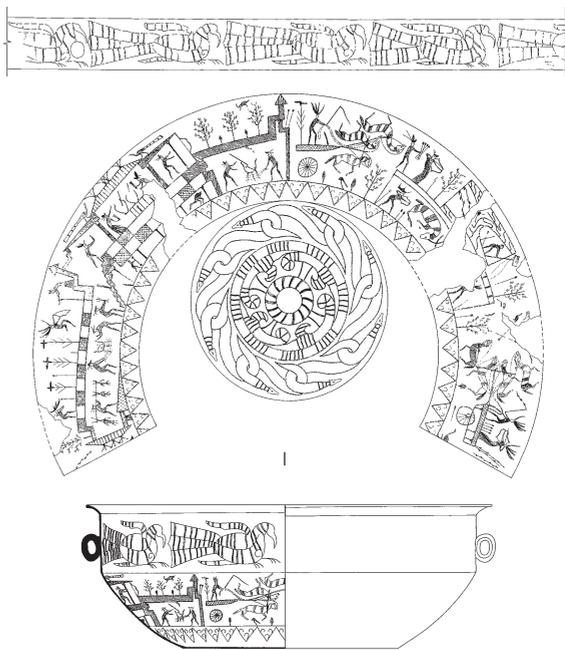


图七 三晋两周文化区甲类刻纹铜匣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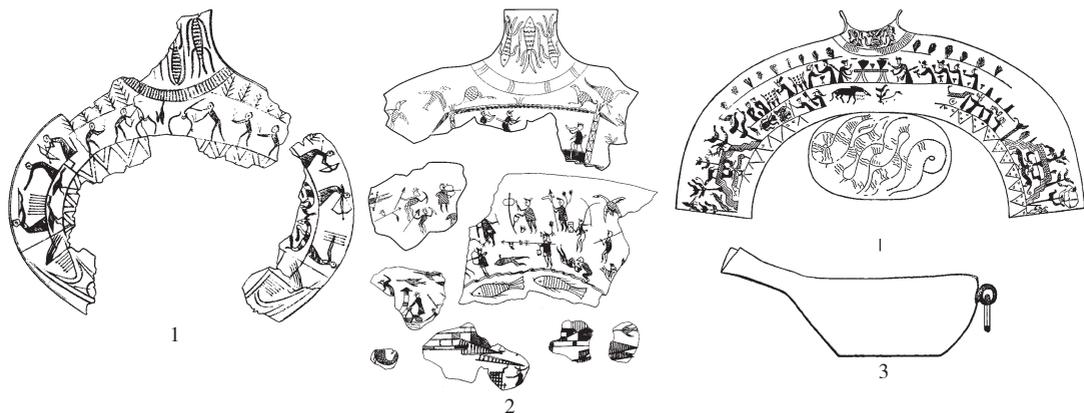
1. 太原金胜村M251 : 540 2. 陕县后川M2042 : 8 3、5、7. 长治分水岭M84 : 93 4、6、9. 长治分水岭M79 : 8  
8. 长治分水岭M12出土

匣 定襄中霍村M1 : 14, 底残, 流部图像为三游鱼。腹部图像中的人物或着长袍, 或着袴, 均无冠(图九, 1)。潞城潞河M7 : 156, 底残, 流部图像为三游鱼。腹部图像中有陆地作战场景的攻战图, 为吴越文化区所不见。仅一人似戴三叉冠, 个别似戴圆帽, 其余无冠(图九, 2)。陕县后川M2144 : 7, 底部和流部图像均同于吴越文化区, 腹部图像分为两层或三层, 图像内容有飨礼、狩猎和神山与神怪(图九, 3)。神山下的怪兽头顶斗拱以支撑山顶的图像亦不见于吴越文化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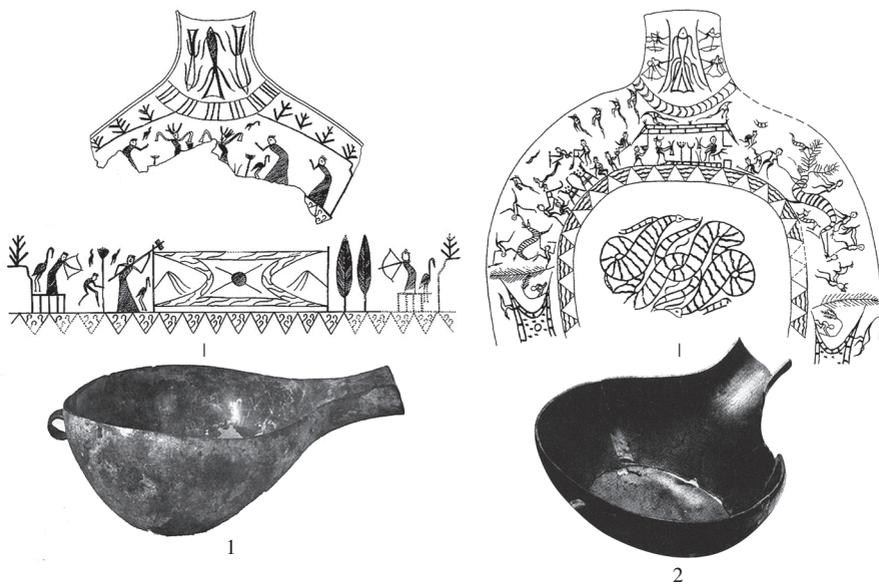
另有两件匣出土信息不清楚。传出辉县者底残, 流部图像为三游鱼, 刻划草率; 腹部图像中的人物个别着袴, 但着长袍者亦有无冠者(图一〇, 1)。洛阳征集铜匣底部图像为水蛇纹, 流部图像分为三列, 两侧图像各为两个着袴、无冠的持弓



图八 三晋两周文化区乙类刻纹铜盘(灵寿城穆家庄西M8101 : 4)



图九 三晋两周文化区乙类刻纹铜匱图像  
1. 定襄中霍村M1: 14 2. 潞城潞河M7: 156 3. 陕县后川M2144: 7



图一〇 三晋两周文化区乙类刻纹铜匱及图像  
1. 传出辉县 2. 洛阳地区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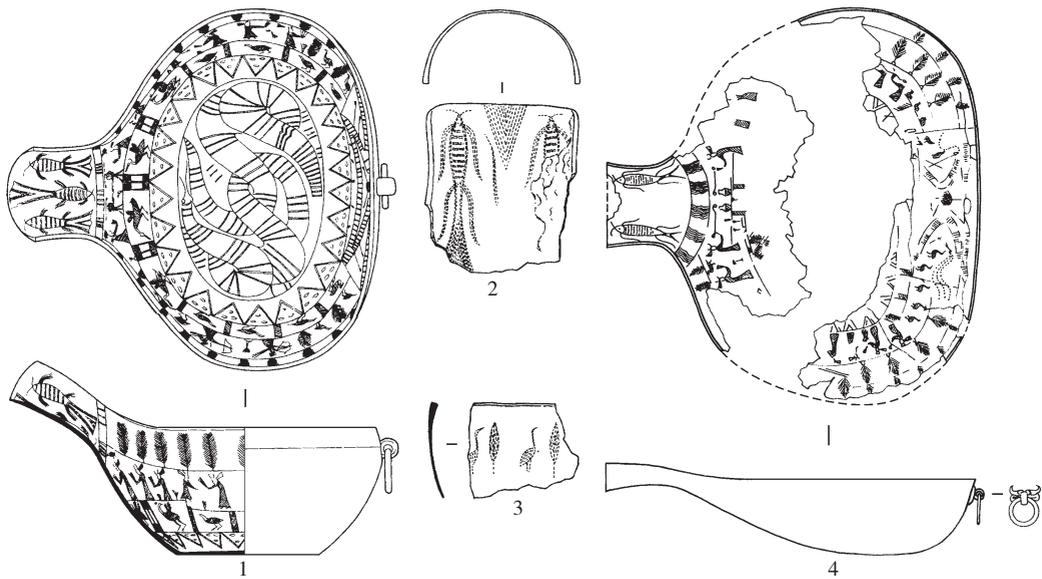
者；腹部图像中的人物均着袴，仅两人似戴冠，形制不清，余者无冠（图一〇，2）。两件匱中的建筑、人物、动物形象等简单而随意，刻划潦草，不见于吴越文化区。

陕西凤翔高王寺铜器窖藏发现一件刻纹匱。从文字描述看，大体与吴越文化区战国早期流行的图像相近。定襄中霍村M1还出土有一件残破的刻纹盘，仅知内壁刻有鱼纹。

### （三）楚文化区

襄阳余岗M173: 4匱（图一一，1）、

长沙黄泥坑M5（长沙楚墓M186）: 2匱（图一一，4），形制和图像均同于吴越文化区的同类器物，流部和腹部图像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的I式。澧县皇山岗M1: 1匱和平顶山应国墓地M10: 51匱均残，仅知前者底部图像为水蛇纹，后者流部图像为三游鱼，腹部仅存口沿下的水滴状树木纹和立鸟（图一一，2、3）。上述各器应属于上文所划分的甲类。平顶山应国墓地M10还出有一件刻纹盘，仅有文字描述，形制与图像内容不详。



图一— 楚文化区刻纹铜匱及图像  
1. 襄阳余岗M173 : 4 2、3. 平顶山应国墓地M10 : 51 4. 长沙黄泥坑M5 : 2

#### (四) 齐文化区

长岛王沟M2出土有两件鎏金刻纹盘，M2 : 2，仅见底部图像为水蛇纹（图一二，3），相当于吴越文化区同类图像的I式。M2 : 1腹部图像（图一二，1）与吴越文化区刻纹盘腹部图像的II式相同。长岛王沟M2 : 3鎏金刻纹匱仅存流部，图像为三游鱼（图一二，2）。平度东岳石M16 : 60匱残，仅余表现射侯图像的腹部残片（图一二，4）。两件匱流部与腹部的图像均同于吴越文化区匱相同部位的I式。上述诸器应属于上文所划分的甲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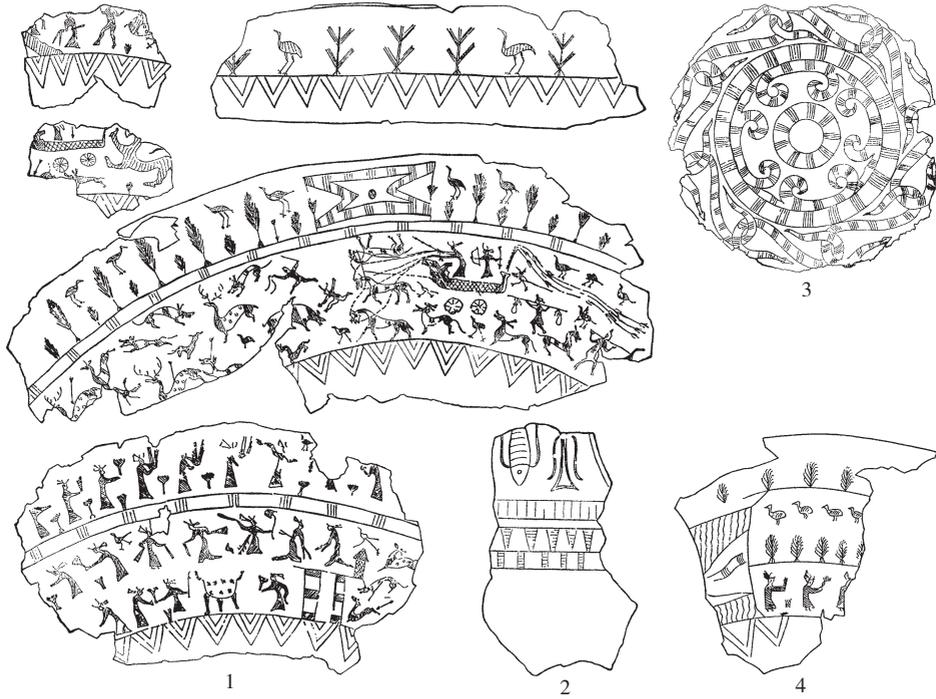
#### (五) 燕文化区

北京市通州区中赵甫出土的刻纹匱已残，流部图像为三游鱼（图一三，2），腹部图像与吴越文化区的I式相同。建昌东大杖子M11 : 2匱残，流部图像为三游鱼，流下腹部为在双层建筑中进行的飨礼（图一三，1），相当于吴越文化区的II式。东大杖子M45 : 40匱基本完整，底部图像有水蛇纹，流部图像为三游鱼，腹部图像出现似人首兽身的神怪和枝干平伸且两端上举

的树木（图一三，3），与吴越文化区的III式相近。上述诸器整体上与吴越文化区所出同类器非常接近，应属于上文所划分的甲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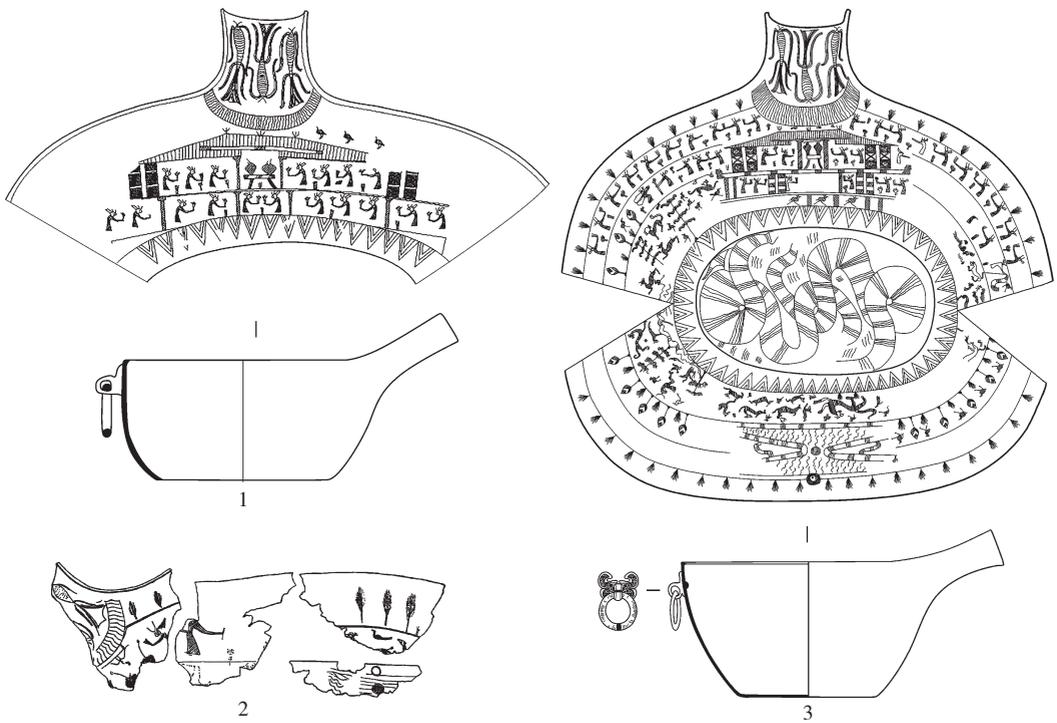
东大杖子M45 : 13盘底部图像最外层为相互勾连的水蛇纹（图一四，2、3），接近于吴越文化区盘底图像的II式。腹部图像分两层，上层残破，有射侯（图一四，1）；下层图像有狩猎和舟战（见图一四，2）。射侯与狩猎图像与吴越文化区铜盘的II式图像相近，但舟战图却不见于吴越文化区，而是同时期三晋两周地区画像铜器中水陆攻战纹的主要元素<sup>[43]</sup>。共有三组相同的舟战图与狩猎图的组合重复出现，这种以一组图像重复出现的构图方式亦是三晋两周地区画像铜器中常用的手法<sup>[44]</sup>，不见于吴越文化区刻纹铜器，应属于上文所划分的乙类。

涑水永乐村发现的刻纹匱因残破，只知流部图像为游鱼，腹部图像有人物和植物。易县燕下都西贯村M6 : 4刻纹匱的勺部刻有一鱼纹，与刻纹匱流部所刻游鱼相同，柄部所刻似一鸟，柄首已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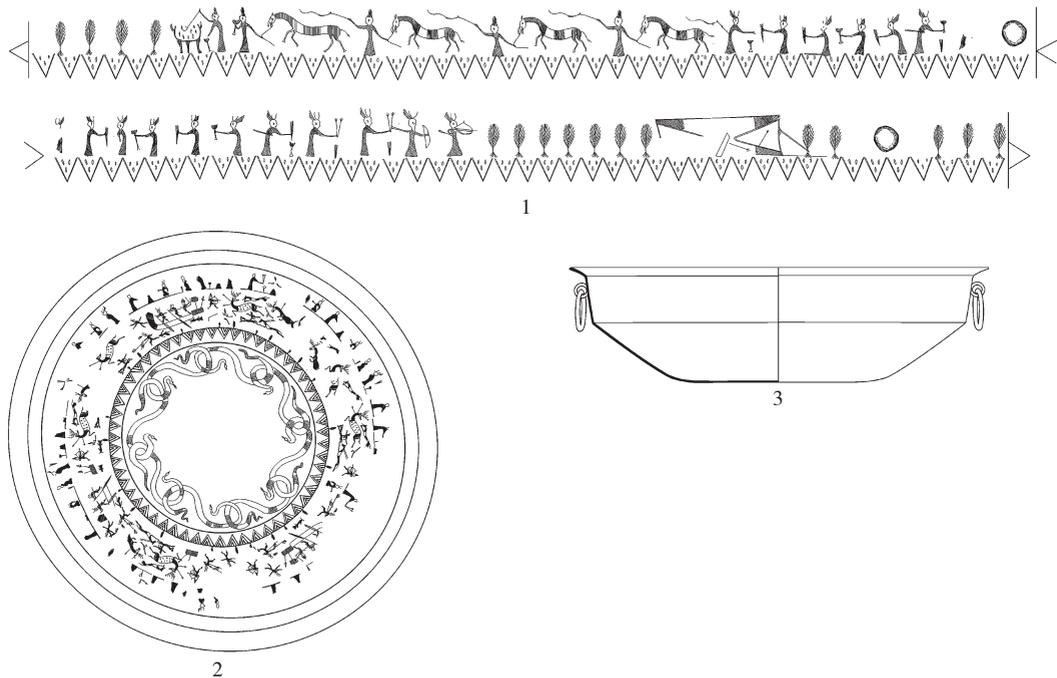
图一二 齐文化区刻纹铜器图像

1、3. 鍍金盘（长岛王沟M2：1、2） 2. 鍍金匝（长岛王沟M2：3） 4. 匝（平度东岳石M16：60）



图一三 燕文化区刻纹铜匝及图像

1. 建昌东大杖子M11：2 2. 北京通州区中赵甫出土 3. 建昌东大杖子M45：40



图一四 建昌东大杖子M45：13刻纹铜盘及腹、底部图像  
1. 腹部上层图像 2. 腹部中下层及底部外层图像 3. 刻纹盘

### 三

通过对各文化区出土刻纹铜器进行分析，可知吴越文化区出土刻纹铜器的墓葬年代最早可到春秋末年，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盘、鉴和匜在图像内容与表现手法上不仅表现出相近的特征，而且具有相同的变化轨迹和基本完整的发展序列。这些都表明刻纹铜器最早出现于吴越文化区，并且在这里经历了发生、发展、消失的完整过程。

通过对吴越文化区以外地区出土的刻纹铜器进行研究，可以发现以下值得关注的现象。

第一，其他地区随葬有刻纹盘、匜的墓葬的年代大体从战国早期早段到战国中期早段，但除陕县后川M2144：7（乙类）、东大杖子M45：11、40两件匜（甲类），以及辉县琉璃阁M1：51奩（甲类）以外，其余盘、匜的纹饰均为吴越文化区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早期流行的式别，即这几个地区即使到了战

国中期，刻纹铜器的纹饰仍是以吴越文化区战国早期流行的纹饰为主，而没有表现出与之相同的发展趋势。

这种现象表明，吴越文化区的刻纹铜器很可能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早期存在着一个集中向外的传播过程，部分在吴越文化区生产的刻纹铜器流入到其他地区，因其具有极高的装饰性和观赏性，从而被接受者所喜爱，或因使用者的去世而随葬，或留传于后人，又因后人的去世而放入墓中。

第二，吴越文化区以外地区的刻纹铜器，可依图像内容、表现手法等分为甲、乙两类。甲类刻纹铜器在图像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与吴越文化区同类器物相同，如人物着长袍，戴三叉冠，车辆逆时针方向行驶等。而乙类刻纹铜器，虽然图像题材与吴越文化区相同，但许多特点为吴越文化区所不见，如人物多着袴，无冠，建筑有横置的屋顶，车辆行驶方向有顺时针者，出现舟战与陆战图等。还有一些图像组合为吴越文

化区所不见，如在露天进行的飨礼与神怪的组合，神山下出现斗拱等；而腹部图像分组重复出现也不见于吴越文化区。更值得注意的是，乙类刻纹铜器图像的表现手法多显简单，刻划潦草。

这种现象说明，吴越文化区以外地方发现的刻纹铜器，在生产或制造方面或有不同。甲类刻纹铜器应该是制作于吴越文化区，作为完整器物流传到其他地区。乙类刻纹铜器在具体图像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如出现舟战和陆战之类的场景，一组画面重复出现等，都是三晋两周地区同时期画像铜器中常见的内容和构图方式。在具体的刻划技法上表现为潦草、随意、不规范，似表明这些铜器上的刻纹并非出于成熟工匠之手。由此可以推测，乙类刻纹铜器很可能是由不谙于刻纹技术的工匠，以吴越文化区的刻纹铜器为范本，并加入了当时三晋两周地区流行的画像铜器的部分因素制作出来的模仿之作。这类铜器主要发现于三晋两周文化区，因此其生产地点很可能就在当地。由于图像大部分是吴越文化区战国早期流行的式别，表明这些模仿之作在战国早期已有，但从部分乙类刻纹铜器中出现了吴越文化区战国中期流行的神山和神怪纹看，有些模仿是在战国中期进行的，即是以战国早期刻纹铜器流行的图像为主，再加上战国中期吴越文化区流行的神山和神怪纹等元素，造就了乙类刻纹铜器中那些看上去较为特殊的内容组合。

需要说明的是灵寿城穆家庄西M8101：4和东大杖子M45：13，两件盘形制相近。穆家庄西M8101为中山国贵族墓葬，东大杖子M45墓主人的身份尚有争议，或认为是扩张至东北地区的燕国贵族，或为燕扩张所至地区的土著首领。如前文所述，这两件刻纹铜器很可能是在三晋地区由当地工匠生产后，辗转流入中山国或辽西地区。

#### 四

综合以上分析，吴越文化区的刻纹铜器在战国早期有一个集中向外传播的过程。就目前所见，这种传播对三晋两周地区的影响最为强烈，不仅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来自吴越地区的刻纹铜器，还出现了本地工匠的模仿之作。这表明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三晋地区与吴越地区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文化及物质上的交流。

由附表一可知，随葬有刻纹铜器的墓葬均随葬有青铜礼器，说明这种文化或物质上的交流，主要是在当时社会的贵族阶层之间进行。不过，在同时期其他随葬有青铜礼器的墓葬中随葬刻纹铜器的现象并不普遍。如六合程桥共发现三座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墓主人被认为是与吴国关系密切的贵族<sup>[45]</sup>，其中只有M1随葬有刻纹铜器。随葬有刻纹匜和盘的镇江王家山墓，学界多认为其为吴墓。在丹徒北山<sup>[46]</sup>、吴县何山<sup>[47]</sup>、丹徒谏壁粮山<sup>[48]</sup>、苏州虎丘<sup>[49]</sup>等地都发现了年代基本在春秋晚期的吴国贵族墓葬，这些墓葬均未见随葬有刻纹铜器。淮阴高庄M1，学界多认为其为流亡于越国的徐国贵族的墓葬，文化面貌与越国墓葬相同，因此多将其纳入越墓进行讨论。在浙江安吉龙山<sup>[50]</sup>、长兴鼻子山<sup>[51]</sup>、绍兴狮子山<sup>[52]</sup>，江苏无锡鸿山<sup>[53]</sup>等地均发现有与淮阴高庄M1年代大体相当的越墓，但也仅有高庄M1随葬了数量较多的刻纹铜器。

据不完全统计，三晋两周地区年代大体在战国早期到中期的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共90余座，仅10余座墓葬随葬有刻纹铜器。长江中游发现的150余座年代在战国早中期的随葬有青铜礼器的楚墓中，目前也仅在长沙黄泥坑、澧县皇山岗和襄阳余岗各有一座楚墓，以及平顶山应国墓地M10随葬了刻纹铜器。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半岛年代在战国时期的齐墓大约为60座，仅在平度东岳石和

长岛王沟两个地点发现了随葬刻纹铜器的墓葬。到目前为止发现的燕文化墓葬中,年代在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随葬有青铜礼器的墓葬共十几座,也只在北京市通州区中赵甫和燕下都西贯村M6发现有刻纹铜器。另外在燕文化影响所到地区的辽宁建昌东大杖子遗址共有9座墓葬随葬有中原特点的青铜礼器,其中仅M11和M45随葬有刻纹铜器。

综合以上可知,并不是所有的贵族墓葬都随葬有刻纹铜器,即刻纹铜器并不是墓主人贵族身份或地位的必要标识物。而随葬有刻纹铜器的墓葬仅是贵族墓葬中的一小部分,似乎说明这些墓葬的墓主人是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而使用刻纹铜器随葬。目前已统计各地区随葬有刻纹铜器的墓葬共33座,虽年代不同,随葬青铜礼乐器的种类及数量也不同,但其中有22座墓葬都随葬了青铜兵器,镇江王家山墓还随葬有被认为是军乐器的罇于。这一现象说明随葬有刻纹铜器墓葬的墓主人大多具有一定的军事背景。

有学者注意到,在三晋地区出土的刻纹铜器以及大量的其他吴国遗物,如吴王夫差鉴与剑、吴王光剑等,指出在春秋末到战国初年时晋吴通好,曾发生吴季札使晋、晋嫁女于吴、晋叔向使吴、黄池之会等几次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三晋地区出土的刻纹铜器以及其他吴器,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通过聘问、会盟、婚嫁等渠道由吴国流通到晋国<sup>[54]</sup>。除上述晋吴之间交流的渠道之外,文献中所记春秋末年晋吴通好的初始目的是“约伐楚”,当时辅佐晋景公的楚人巫臣使吴,主要亦是“教吴乘车用兵”<sup>[55]</sup>,说明参与晋吴通好的双方都具有一定的军事背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随葬有刻纹铜器的墓葬绝大多数是贵族墓葬,又多共出青铜兵器这一事实,虽然不能解读为这些墓葬的墓主人是晋吴通好的直接参与者,但是对解释集中发生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早期吴越地区刻纹铜器的对外传播、三晋地区对刻纹铜器

的接受等,应该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新的观察视角。

最后想说明的是,刻纹铜器因刻划有精美的图像,有些器物还有鎏金等装饰工艺,其作为艺术品的价值可能远远超出作为礼器的意义。而战国中期以后刻纹铜器的迅速消失,很可能与更加精美的漆器工艺的发展有关。

## 注 释

- [1] 河北怀来北辛堡M1出土两件饰有刻划纹的薄壁铜缶,其上刻划的纹饰以图案化的蕉叶纹、涡纹为主。另在山西隰县瓦窑坡M30出土一件刻纹铜斗,在锻造成形的器物外壁刻划有图案化的几何纹,内壁刻有四条鱼纹。考虑到这几件器物的纹饰与本文研究的刻纹铜器所表现的各种活动场景不同,所出器形亦为孤例,因此本文的研究不包括上述几件器物。
- [2] 东周时期的盘和鉴均为水器,本文将直径在40厘米以上、深度在17厘米以下,即腹深不足口径二分之一者统称为盘;将口径在40厘米以上,腹深与口径比超过或接近二分之一者称为鉴。
- [3] 关于东周时期镶嵌花纹铜器的制造工艺,可进一步分为铸镶法和嵌镶法。参见贾云福等:《曾侯乙墓青铜器红铜纹饰铸镶法的研究》,见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附录一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
- [4] 这种工艺的特点是纹饰均为铸造出的阳纹,典型者如辉县琉璃阁墓地出土的狩猎纹铜壶。参见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第62~66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 [5] 王恩田:《辉县赵固刻纹鉴图说》,见《文物集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 [6] a.王立仕:《淮阴高庄战国墓铜器刻纹和〈山海图〉》,《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  
b.王崇顺、王厚宇:《淮阴高庄战国墓铜器图像考释》,《东南文化》1995年第4期。
- [7] 许雅惠:《东周的图像纹铜器与刻纹铜器》,《故宫学术季刊》2002年第2期。与这种观点相似的还有李学勤先生,他认为有刻纹的槌制

- 铜器似乎是南、北同时出现的。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178、1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 [8] 最近有研究者提出瓦窑坡M30所出铜斗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刻纹铜器，年代为春秋中期，并因此认为“刻纹铜器应兴起于三晋地区”（南普恒等：《隰县瓦窑坡墓地刻纹铜斗的刻纹形态及相关问题》，见《文物保护研究、实践与教育——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创立三十周年论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但瓦窑坡M30出土铜斗在器物种类、纹饰表现方式等均与本文讨论的刻纹铜器存在明显区别，依目前材料并不能显示二者之间存在着发展演变关系。
- [9] 代表性观点参见白云翔：《辽宁东大杖子墓地出土的刻纹铜器及相关问题》，见《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
- [10] 李夏廷：《关于图像纹铜器的几点认识》，《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
- [11] 在一些博物馆中还有不知出土地点的收藏品。  
a. 马承源：《漫谈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文物》1961年第10期。  
b. 梓溪：《战国刻绘燕乐画像铜器残片》，《文物》1962年第2期。
- [12]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第3期。
- [13] 吴山菁：《江苏六合县和仁东周墓》，《考古》1977年第5期。
- [14]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 [15] a. 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b. 淮安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县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1994年。
- [17] 徐禅菲、姚智远：《浅释洛阳新获战国铜匜上的刻纹图案》，《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 [18]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第110~120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b.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第62~66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 [1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晋东南地区文化局：《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年第6期。
- [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 [2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 [22] 李有成：《定襄县中霍村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1997年第5期。
- [23]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1962年第12期。
- [2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 [2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行唐县故郡东周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
- [26]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岗楚墓》，科学出版社，2011年。
- [27] 澧县博物馆：《湖南澧县皇山岗楚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7集，1999年。
- [28]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楚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 [2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平顶山应国墓地十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
- [30]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考古》1962年第10期。
- [31]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群》，《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 [3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第517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 [33] 《河北省涞水县永乐村发现一批战国铜、陶器》，《文物》1955年第12期。
- [34] 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8期。
- [35] a.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11期。  
b.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3年发掘简报》，见《边疆考古研究》第18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
- [36] 韩伟、曹明檀：《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

- 藏》，《文物》1981年第1期。
- [37]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第19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38] 滕铭予：《三晋两周地区出土圆形当卢研究》，见《纪念张忠培先生文集·学术卷》，故宫出版社，2018年。
- [39] 同[35]a。
- [40] a.林沅：《中国东北系铜剑再论》，见《考古学文化论集》（四），文物出版社，1997年。  
b.朱凤瀚：《论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出土的短茎曲刃青铜短剑》，见《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 [41]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第18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42] 由于其他各文化区出土的刻纹铜器同样需要与吴越文化区的同类器物进行比较，因此对于三晋两周文化区刻纹铜器甲、乙两类的划分，也适用于其他各文化区。
- [43] 画像铜器中的水陆攻战纹，以山彪镇M1所出铜鉴最具代表性。参见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第18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 [44] 三晋两周地区画像铜器一组图像内容重复出现的手法在很多器物上都可见到，典型者如山彪镇M1所出水陆攻战纹铜鉴。参见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第18、19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 [45] a.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第1821、18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b.张敏：《吴越文化比较研究》第234、235页，南京出版社，2018年。
- [46] 江苏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
- [47]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何山东周墓》，《文物》1984年第5期。
- [48] 镇江市博物馆：《江苏丹徒出土东周铜器》，《考古》1981年第5期。
- [49] 苏州博物馆考古组：《苏州虎丘东周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 [5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龙山越国贵族墓》，《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 [5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兴县博物馆：《浙江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文物》2007年第1期。
- [52]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 [53] a.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期。  
b.南京博物院等：《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 [54] a.陶正刚：《山西出土的吴越地区青铜器及其研究》，见《陶正刚考古文集》，三晋出版社，2016年。  
b.劳伯敏：《从有铭吴越青铜器看吴越与晋的文化交流》，《东方博物》2006年第4期。  
c.田建文：《刻纹铜匜说晋吴》，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76期，2018年。
- [55] a.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835页，中华书局，1990年。  
b.[汉]司马迁：《史记·晋世家》第1679页，中华书局，1975年。

附表一 出土刻纹铜器墓葬登记表

分区	墓 葬	青铜容器及乐器	青铜兵器	年 代	备 注
吴越文化区	六合程桥东周墓	刻纹盘1，鼎1、缶1、编钟9	剑3、戈4、戟1、矛1	春秋末年	被破坏，刻纹铜器残片出于填土
	六合和仁东周墓	刻纹匜1，鼎1	剑3、戈3、矛2、镞1、镞8	战国早期	部分器物为村民挖出后征集
	镇江王家山	刻纹匜1、盘1、鉴1、盃1、虎子形器1、罍于3、句罐1	剑1、戈3、矛7、戟1、镞2、镞33	战国早期	被破坏，部分器物为征集
	淮阴高庄M1	刻纹盘7、盆1、匜6、算形器4，鼎11、鉴4、盘11、匜1、壘2、盃2、甗1、觥1、铎1	戈3、镞1、镞18	战国中期	被盗掘，部分器物为征集

续附表一

分区	墓 葬	青铜容器及乐器	青铜兵器	年 代	备 注
三晋两周文化区	太原金胜村 M251	刻纹匝1, 鼎27、豆14、壶8、盘2、匝1、鸟尊1、鉴6、舟4、甬2、簠2、鬲5、甗2、炭盘1、格2、勺6、肉钩14、扒1、灶1、钵1、罐1、平底釜8、高足釜3、器盖2、耳杯1、编钟19、铎1	剑6、戈31、钲169、矛20、戟9、钺10、镞510、藤弓1等	战国早期早段	有车马坑, 殉人4
	定襄中霍村M1	刻纹匝1, 鼎4、豆4、壶2、盘1、甗1		战国早期早段	被破坏
	潞城潞河M7	刻纹匝1, 无盖鼎3、盖鼎8、盖豆4、方座豆2、盘豆2、提链壶1、瓠壶1、盘3、舟1、鉴4、甬2、铎尊1、簠2、罐2、甗1、勺2、炭箕1、甬钟16、钮钟8、钲4	剑2、戈11、矛7、镞14、钲6	战国早期早段	有一定破坏
	长治分水岭 M84	刻纹匝1、盘1, 鼎5、盖豆2、壶4、匕2	镞2	战国早期晚段	
	陕县后川 M2040	刻纹盘1, 鼎7、无盖鼎5、鼎钩10、莲花方壶2、壶3、鼎5、鬲形鼎3、甗1、豆8、无盖豆2、簠2、敦2、舟2、勺5、匕2、毕1、盘2、鉴4、匝2、编钟20、编钟9	剑2、戈17、矛3、戟2、钲33、镞4、镞177	战国早期晚段	被唐墓打破
	陕县后川 M2042	刻纹匝1, 鼎3、豆2、壶2、舟1		战国早期晚段	
	灵寿城穆家庄西M8101	刻纹盘1, 鼎1、盖豆1、壶1、甬1	戈2、铍1、镞10、镞杆帽3	战国早期晚段	墓室被严重破坏
	陕县后川 M2124	刻纹匕1	戈2、钲2	战国早期晚段	
	邯郸百家村M3	刻纹匕1	剑1、戈5、矛1、戟1、钲4、镞28	战国早期晚段	殉人3
	邯郸百家村 M57	刻纹匝1(残, 形制不清)	剑1、戈3、矛2、戟2、钲7、镞14	战国早期	殉人3
	行唐故郡M53	刻纹鉴1, 鼎2、敦1、壶2、匝1	剑1、铍2、镞2、镞2	战国早期	殉人4
	长治分水岭 M79	刻纹匝1	剑1、戈1、镞20	战国中期早段	被盗扰
	长治分水岭 M12	刻纹匝1, 盖鼎5、方座簠1、圆壶2、错金舟2、簠3、扁球形敦2、盘1、鉴3、甗1、钲2	剑2、戈6、矛2、镞4、镞62	战国中期早段	
	陕县后川 M2144	刻纹匕1(形制不清)、匝1, 鬲形鼎3、豆2、壶2、盘1		战国中期早段	
	辉县赵固M1	刻纹盘1, 鼎2、鬲鼎1、鬲1、甗甗1、簠2、壶2、鉴1、栝1	戈4、矛2、戟2、镞1、戈秘冒2、剑3、镞78、斧5、斲1、削1、刻镞刀1	战国中期早段	部分被明代水井打破
辉县琉璃阁M1	刻纹匝1, 鼎1、方壶1		战国中期	被盗掘	

分区	墓 葬	青铜容器及乐器	青铜兵器	年 代	备 注
楚文化区	襄阳余岗M173	刻纹匜1, 鼎1、敦1		战国早期晚段	
	澧县皇山岗M1	刻纹匜1, 鼎1、敦1、缶1	剑2、矛1、戈5、镞18	战国早期	被破坏
	平顶山应国墓地M10	刻纹匜1、盘1, 鼎5、敦2、尊缶2、舟1、盥缶1、勺1		战国早期	被盗扰
	黄泥坑M5(长沙楚墓M186)	刻纹匜1, 鼎2、盘1、勺2		战国中期	
齐文化区	平度东岳石M16	刻纹匜1, 鼎1、敦2、提梁壶1、盘1	剑3、戈6、镞40	战国早期晚段	
	长岛王沟M2	鎏金刻纹匜1、盘2, 鼎1、豆2、提梁壶1、舟1、敦1		战国中期早段	墓坑被破坏
燕文化区	涑水永乐村	刻纹匜1, 壶1、豆1、敦1	剑1	战国早期	村民挖井发现
	北京市通州区中赵甫	刻纹匜1, 鼎3、豆1、敦1、匕3、勺1	剑2、戈2、镞2	战国中期早段	墓坑被破坏
	建昌东大杖子M11	刻纹匜1, 鼎2、盖豆1、壶2、盘1、勺2	剑1、戈3、钺1、镞31	战国中期早段	
	建昌东大杖子M45	刻纹匜1、盘1, 鼎2、豆1、壶2、筒形器1、勺1	剑2、戈3、钺1、镞91	战国中期早段	
	燕下都西贯村M6	刻纹匜1		战国中期	

附表二

各文化区出土刻纹铜器统计表

文化区	器物号	器 类	流部图像	底部图像	腹部图像	出土刻纹铜器墓葬年代
吴越文化区	江苏六合程桥M1	盘	无	I式	I式	春秋末年
	镇江王家山东周墓: 36	盘		I式	II式	战国早期
	镇江王家山东周墓: 采52	鉴		I式	II式	战国早期
	淮阴高庄M1: 48	盘		I式	II式	战国中期
	淮阴高庄M1: 27	盘		不清	II式	战国中期
	淮阴高庄M1: 0149(残)	盘		II式	II式?	战国中期
	淮阴高庄M1: 3	盘		III式	III式	战国中期
	淮阴高庄M1: 0146	盘		IV式	IV式	战国中期
	淮阴高庄M1: 0147	盘		不清	IV式	战国中期
	淮阴高庄M1: 114	算形器		不清	IV式	战国中期
	淮阴高庄M1: 0153	不清		不清	IV式	战国中期
	淮阴高庄M1: 0154	不清		不清	IV式	战国中期
	淮阴高庄M1: 0155	不清		不清	IV式	战国中期
	镇江王家山东周墓: 采51	匜		I式	水蛇纹	I式
	六合和仁东周墓	匜	II式	无	II式	战国早期
	淮阴高庄M1: 0137	匜	无	无	III式	战国中期
淮阴高庄M1: 0138	匜	III式	无	IV式(外壁)	战国中期	

续附表二

文化区		器物号	器类	流部图像	底部图像	腹部图像	出土刻纹铜器墓葬年代
三晋两周文化区	甲类	长治分水岭M84 : 7	盘	无	I式	II式	战国早期晚段
		行唐故郡M53 : 7	釜		无	不详	战国早期
		陕县后川M2040 : 76	盘		无	II式	战国早期晚段
		辉县赵固M1 : 73	盘		无	II式	战国中期早段
		辉县琉璃阁M1 : 51	奩?		IV式	III式	战国中期
		太原金胜村M251 : 540	匜	I式	水蛇纹	I式	战国早期早段
		陕县后川M2042 : 8	匜	I式	水蛇纹	I式	战国早期晚段
		长治分水岭M84 : 93	匜	I式	水蛇纹	I式	战国早期晚段
		长治分水岭M79 : 8	匜	I式	无	II式	战国中期早段
		长治分水岭M12出土	匜	II式	无	II式	战国中期早段
三晋两周文化区	乙类	灵寿城穆家庄西M8101 : 4	盘	无	I式	II式	战国早期晚段
		定襄中霍村M1 : 14	匜	I式	无	I式	战国早期早段
		潞城潞河M7 : 156	匜	I式	无	I式	战国早期早段
		陕县后川M2144 : 7	匜	I式	水蛇纹	III式	战国中期早段
		传出辉县	匜	I式	水蛇纹	I式	不清
		洛阳征集	匜	II式	水蛇纹	II式	不清
楚文化区	甲类	襄阳余岗M173 : 4	匜	I式	水蛇纹	I式	战国早期晚段
		平顶山应国墓地M10 : 51	匜	I式	无	I式?	战国早期
		澧县皇岗M1 : 1	匜	无	水蛇纹	无	战国早期
		长沙黄泥坑M5 (长沙楚墓M186) : 2	匜	I式	无	I式	战国中期
齐文化区	甲类	长岛王沟M2 : 2	鎏金盘	无	I式	无	战国中期早段
		长岛王沟M2 : 1	鎏金盘		残	II式	战国中期早段
		平度东岳石M16 : 60	匜	无	残	I式	战国早期晚段
		长岛王沟M2 : 3	鎏金匜	I式	残	I式?	战国中期早段
燕文化区	甲类	北京市通州区中赵甫	匜	I式	残	I式	战国中期早段
		东大杖子M11 : 2	匜	I式	残	II式	战国中期早段
		东大杖子M45 : 40	匜	I式	水蛇纹	III式	战国中期早段
	乙类	东大杖子M45 : 13	盘	无	II式	II式	战国中期早段

(责任编辑 苗霞)

## 本期要览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青关山H105的发掘** 2014~2015年在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地点发掘的大型灰坑H105, 现存坑口大体呈圆形, 斜壁, 底近平。出土有陶器、玉器、金箔和石器。根据出土遗物特点推断H105为三星堆遗址第四期遗存, 年代相当于殷墟二期。H105的发掘, 为探讨青关山台地的形成过程以及三星堆城址的废弃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西岗墓地一号战国墓** 2018年发掘的邾国故城遗址西岗墓地M1, 为甲字形竖穴土坑木椁墓, 葬具为两椁两棺。墓内残存随葬器物有陶器、印纹硬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玉器和贴金箔漆器。根据墓内残存人骨的牙齿测年、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特点, 判断M1的时代应为战国早期。M1的发掘, 为战国早期邾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资料。

**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宫城北墙基址的发掘** 2005~2007年在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宫城北墙区域进行的发掘, 发现了墙体基槽、护墙坡、散水和陶排水管道。出土遗物有大量建筑材料和少量生活用陶器、铜镞、铜钱等。从出土遗物特点推断其为南越国时期的建筑遗存。南越宫城北墙的发现, 为确认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位置和范围等提供了准确的坐标。

**考古学文化、文献文本与吴越早期历史的构建** 系统梳理了东南吴越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分区、来源以及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社会状况, 分析了相关金文释读的多元性和文献中有关吴、越两国起源与早期历史记载的建构性, 指出东南地区西周时期确实存在一支独具特色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 且与东周时期的吴、越文化关系密切。

**东周时期刻纹铜器再检讨** 通过对东周时期刻纹铜器的图像内容、表现手法等进行分析, 指出刻纹铜器最早出现于吴越地区, 并在这里经历了发生、发展、消失的完整演变过程。在春秋末年到战国早期, 吴越地区的刻纹铜器有一个集中向外的传播过程。刻纹铜器对三晋两周地区影响较大, 发现不少为当地工匠的模仿之作, 其他地区的刻纹铜器则多为传播而来。